

于芷山降日前后

肖玉琛

于芷山原是旧东北军上将，东边道镇守使，他所属军队有步兵三个团，骑兵一个团，卫队一个连，计约有5 000人左右。

“九·一八”事变头两天，他为了欢度中秋佳节，由驻防地——海龙县山城镇回到他沈阳月宫胡同私宅，亲眼看到日军残暴的侵略行径，感到身居沈阳市，有生命危险，便在翌晨化装由沈海铁路乘车回到山城镇。接着他又陆续看到由沈阳撤退的东北陆军讲武堂学员和步兵第七旅败溃官兵，听到日军将向东边道继续进犯的传闻，更感到恐惧不安，于是马上下令召集他所属各部队长到山城镇开会研究对策，9月22日，各部队长齐集山城镇召开了会议。

当时于芷山的心神非常慌乱：(1)怕日本军事力量强大，抗拒不了；(2)怕自己巨大的财产因抗日而损失；(3)怕不抗日犯守土有责之罪。当时参加会议的部队长，有步兵第二团长廖两宸、步兵第三团长田德胜、骑兵团长曹秉森，以及镇守使署各处长计约十数人（步兵第一团长姜全我，已在凤城县被日军缴械没有参加，代理步兵第一团长唐聚伍在通化也没有如命前来）。

会上，以田德胜为首的投降派迎合于芷山的心理，认为主张抗日就是自取杀身之祸，说什么日本是世界七大强国之一，以我们这点微不足道兵力和它相抗，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之道，莫如投降它，以图将来。另一部分人认为田德胜说的

是句句有道理，但怕没有上级指示束手不抗，犯未能尽守土有责的罪行，主张边抗边请示。讨论了多时，于芷山决定采取后一部分人的主张，并出了一个主意，借着抗日之名，充实自己的实力。他说，我们抗日必须增加兵力，各部队长回到防地以后，马上从各县征集自带枪马的壮丁500名，把各部的兵力增加到现有人数一倍以上，同时动员老百姓帮助构筑工事。

会后，各部队长回到自己防地，用军事压力迫使百姓服从，到11月间便将预定征集的人数凑足了，新编了步兵两个团和一个步兵大队，骑兵一个大队。这时，兵力由5000人增加到1万人左右。

就在于芷山扩军期间，他相继接到了以大汉奸袁金铠为首的伪奉天治安维持会和大汉奸熙洽、张海鹏等劝降信。同时日军又从风城派来汉奸阎家梅送来敦促他投降的信，威胁说，如不及早投降，日军将进迫山城。这些使他更加决心投降。

但是于芷山为人狡猾奸诈，这时他考虑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巨大财产，同时又不至于犯守土有责的国法。由此，他便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答应向日军投降，但又敷衍日军暂不要进驻东边道地区，说由他负担“东边道治安之责”，只求关东军给他弹药和军饷。并派他的心腹王冠英和阎家梅（旧关东州人精通日语）去沈阳和关东军司令部交涉联络军饷弹药问题。另一方面，派他的亲信李某去北京晋见张学良请求指示。

10月初，即在他扩军“抗日”期间，日人河本大作（原是关东军大佐参谋，爆炸张作霖元凶之一）来到山城，声称要去西安（辽源）煤矿“视察”，要求于芷山派兵保护。于芷山乖乖听命，马上派兵一个连保护他到西安“视察”了一次，其实他是来试探于芷山的行动和侦察军事情况的。

由于于芷山这一勾结日敌行动与河本大佐结下了所谓“友

缘”，为尔后进一步和日敌勾结打下稳固基础。

10月中旬，他派的王、阎二人正和日军接洽投降期间，派去北京李某带回张学良的指示。其内容大意是：日军侵略东北问题待中央来解决，你们暂时可以采取应付手段，即使你们暂时穿上日本军服，我也不责备你们……

于芷山接到上述指示，投降日军有了根据，更增强了投降的决心和信心。此后，对日军的勾结更紧密了。不过他心里对张学良的指示“应付”二字抱有疑虑，应付到什么程度和时期才算对呢？

在11月间，他又召集所属部队长来到山城召开议会，把张学良的指示向各部队长公布了，同时也表示他决心投降，命令各部队长取消抗日部署和停止动员百姓构筑所谓抗日防御工事。

另一方面，他想还有必要常和张学良联络，这样才能作到“两全其美”。于是，又派他的亲信李某去北京常驻，负责和张学良不断联系事宜。

在他决心投降以后，又派他的心腹王冠英去沈阳进一步和日军要人勾结，在日军要人的同意下，把东边道镇守使署改编为东边道保安司令部。

唐聚伍看到于芷山已投降了日军，表示反对，立即在通化率所属部队竖起抗日的旗帜。对此，于芷山以维持东边道“治安”为名，派遣他所属伪军进行“讨伐”镇压，一直到翌年2月，把唐聚伍率领的抗日武装力量瓦解为止。

他的这次罪恶活动，取得关东军的“信任”和“赏赐”，关东军答应还给他“扩军”，补充枪支弹药，当即发给他大量“军饷”，只这一次他就发了不下50万元的国难财。

于得到这次“赏赐”，更加倍地效忠日敌，紧接着又派他所

属伪军进犯辽西地区，“围剿”抗日军“老北风”，不久抗日义勇军“老北风”也被他击溃了。

1932年3月间，伪满中央把伪军系统地改编为五个警备军。于芷山被任命为伪奉天省警备军司令，军衔为陆军上将。伪奉天省警备军司令部设在沈阳市。我经于芷山旧友闵德一的介绍当了该警备军司令部的上尉参谋。

1932年春，“国联”调查团来到伪满调查日军侵略我东北罪恶情况，这时于芷山便主观认为日本尽管军事力量强大，但是它大不过国际联合力量，日军不久即将退出伪满，进而又考虑到他自己将来的下场。为此，便指示他派驻在北京的亲信李某，加倍和张学良取得联系。

他这种模棱两可，一只脚踏两只船的骑墙行动，被日敌侦察到，于是，不久之后，他便遭到了日军的夜袭。

当时，日敌为了便于对各大汉奸的监视，不仅在各省伪警备军司令部上设有指导机构的顾问部，配置日人“顾问”多人，担任监视指导。特别是在伪奉天省警备军司令部内还设有一名日军少将部附，名叫堀内一雄，表面帮助伪司令官办理一切事务，实则对于芷山的进一步监视。

而于芷山觉得常驻沈阳市一再派人去北京感到不方便，因而不理日军顾问部附不要离开沈阳市的要求，常常借词住在山城，这样更招来日敌加倍的怀疑，对他采取了更严密的监视。

日敌的怀疑和监视，他也有所察觉，但他却狂妄的想：“我手下有这样大的兵力，他们虽然用不着考虑我个人被消灭会有什么反映，但他们会顾及到我的部下能安然无事，所以尽管他们不满意我，对我是无可奈何。”

岂知日军对他早已采取了措施：不仅他去山城有日军教官严密监视，而且日军铁道守备队对他也作了严密控制。

于芷山由于他上述狂妄自大的心理，竟把日军对他监视怀疑当作等闲，视为无足轻重。当他去山城镇以后，认为直接监视他的人少了，可以自由随便了，每天不按时上班，甚至成天或几天不到伪司令部去，在他自己开的生意——德裕粮栈里，会同几个买卖人“打麻将牌”作消遣。日子常了，引起日敌的注意，日系教官为了事务联络，有时不得不去德裕粮栈和他“商量”，为此日系教官成岛中佐，曾有两次要他注意，于却置之不理，并以这种“不听”日寇的话，对部下骄矜，俨然标榜自己是一个有“骨头”的男子汉。与此同时，他又买些贵重礼物派人给他的所谓“契友”河本大佐，让他向关东军说“好话”，表示忠诚日军。

于芷山的行动不仅招来日系教官的不满，很快也招来监视他的日军铁道守备队的不满。

主子对奴仆的不满，便用它的“威风”进行“教训”，这是客观的规律。时为1932年6~7月间，为了试探于芷山的动向，日军守备队大队长小川大佐“收抚”了数名土匪头子，其中一名叫于汇川者，纠合不少土匪在山城镇街头和近郊，奸淫妇女、抢夺民财，大肆骚扰。于芷山明知是日军大队长小川唆使土匪干的，只好请罪来得罪小川，来完成自己所谓“维持治安”之责，便逮捕了土匪于汇川。

日酋小川果然借词说：于芷山有意和日军为难，无故逮捕了我收抚的部下，危害了“皇军”的威信。

这时于芷山进退维谷，他想释放土匪于汇川，怕日军要人降罪说他在“维持治安”上失职，不释放于汇川又怕得罪小川。想来想去，为求眼前的“平安无事”还是把土匪于汇川释放了。

于汇川被释后，在小川面前说了于芷山好多的坏话。引起小川对于芷山有了更大的不满。为了缓和与小川的关系，于芷

山又拿出汉奸媚上的本领，小心翼翼地买了几大木箱名牌啤酒和汽水，像进宝似地派人送到小川大队部，可是，事与愿违，小川却利用于送给他的啤酒、汽水，扬言说：“于芷山心坏了，送给我们的啤酒大多数是不能饮用的坏东西。”接着小川又指使他所谓“收抚”的部下，穿上伪警备军的服装，在山城镇近郊村屯进行强抢。随后小川利用这个事件指责于芷山说：“你的军队，太不可靠了，屡次对地方骚扰，你得负全责……”

这时于芷山才了解日酋小川的用心，是有意和他为难，于是表现了汉奸懦弱无能的本质，没有任何的适当处置，只有成天生闷气和部下耍脾气。小汉奸们包括我在内，同样是想不出什么对策来，只有害怕、小心，再不能得罪“皇军”了。

通过观察日酋小川的行动，我认为关东军早有决心在适当的时期铲除于芷山，借以“教育”大小汉奸们。

在7月某日夜，日酋小川已侦察好了于芷山白天打了一天的麻将牌，打算趁着他疲乏熟睡的夜间袭击消灭他。于是，小川在同日傍晚命令他的部下步兵中队，由中队长率领，夜半12时许袭击于芷山住处——德裕粮栈。

于芷山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布置一个排的伪军在德裕粮栈四角炮台上放哨，日军照井中队长了解这个情况，在半夜以前就配置四挺机关枪，对准四角炮台上的步哨，尔后他率领其余部下士兵，大部分冲向德裕粮栈大门，用一小部分人包围德裕粮栈其他三面。

半夜12时袭击行动开始了。这时于芷山的卫队在炮台上清楚地看到来袭的军队是日军的守备队，想要开枪射击，又想是日本军队，开枪射击后会产生重大的后果，吓得不敢开枪射击，任凭凶狠的日军凶猛地冲击德裕粮栈大门。在日军没有冲开大门前，哨兵已把日军来袭的情况报告酣睡中的于芷山，于芷

山惊闻这个消息，马上跑到门房电话室向伪司令部打电话，要卫队长赫慕侠来德裕粮栈。这个电话刚刚打完，日军已将大门冲开，拥进院内，有的日兵向黑暗处投掷手榴弹、鸣枪，有的日兵四处搜索，包括到于的住宅搜查。当时有四五个日兵上到门房楼上，看见于芷山正在打电话，马上用刺刀将电话线割断，由于不认识于芷山本人，便当着于芷山追问于的下落，于芷山战战兢兢地用手一指说在那边。这四五名日兵便顺着他指的方向而去。趁着这个机会，于溜出门登上平台跳进西邻一个买卖院中去。

于芷山逃到西邻去后，日军在德裕粮栈院内进行严密搜索，半个多小时之后，也不见于芷山的踪影，十分颓丧，不得已撤走了。

日军正在夜袭德裕粮栈的时候，配合夜袭的日军宪兵巡逻队三四人，乘坐着摩托车驰驱街头，夜袭的日军误认为是伪军的摩托车，对它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一名宪兵。

于芷山的卫队长赫慕侠看到这种情况，悄悄地把他所属一个营的兵力，从兵营中调到街外躲起来。

日酋小川大队长接到执行夜袭任务的中队长的报告后，得知既没有抓到人，还死了一名宪兵，心中更怒愤，但又不知道于芷山藏在哪个地方，因此，只好等探到于芷山下落后，再行对策。

在日军夜袭德裕粮栈的时候，由于东街一时激烈的枪声，赫慕侠、秘书孙维珍、少校参谋陶永芳，都先后来到伪司令部。我把我接于芷山电话的情形报告了赫慕侠。

赫慕侠听我报告后，他已了解日军袭击德裕粮栈的事情，这时他当然有些生气，但因为日本军队干的，他也一筹莫展，担心日本军要毁灭我们。可又没有良策对付，只好找人求情。随

命我和陶永芳到教官室去请教官，那知教官也是夜袭的主谋者之一，他没有在教官室，早已去日军宪兵队本部躲藏起来了。赫又命我二人到宪兵队去找教官，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害怕，但也只好同陶永芳去日本宪兵队。到宪兵队后，日军持着枪凶狠地讯问我们二人说：“来这干什么？”我们说：“来请威海教官回司令部”。但日本教官躲在里屋不放声。我们被扣留近一小时，才被放回伪司令部。

我二人回到伪司令部，天已快亮了，还未及将去宪兵队的经过报告给赫慕侠，小川派来的武装士兵凶狠狠地闯进了伪司令部院内，一名翻译和一名士兵闯入伪司令部办公室，对着赫慕侠说：“大队长要满军卫队团长和一名参谋马上随我们到大队部去。”

赫慕侠表现十分惊恐不安，唯唯诺诺地答应说：“这就去。”一名参谋叫谁去好呢？他想，此去凶多吉少，留一个阶级高的参谋在家好主持点事情，便命令说：“肖参谋随我去大队部。”

我二人在日军武装士兵押解下，约走20分钟到达大队部。大队部设在德裕粮栈外栈，处在铁路旁边，周围有大墙，院子很宽敞，我二人进入大队部大门里，看到不仅甬路两旁不知设有多少伏哨，大墙周围还布满了武装士兵，似乎要枪决犯人的样子，当我二人进入大队办公室时，右边坐的是照井中队长和一些日军下级军官，左边有一名副官和一名翻译，他们各个都横眉立目地注视着我二人。

随后，小川恶狠狠地指着赫慕侠逼问说：“你是卫队团长吗？”赫笑脸回答说：“我是。”接着逼问：“你把于芷山藏在哪儿？快快说，不说我就杀了你。”赫惊慌地哀求说：“我实在是不知道他的下落，我要是知道的话，哪敢不说，请队长息怒。”接着，小川又问我：“你是参谋么？”我回答说：“是”。又追问

说：“参谋应该知道于芷山的下落，快说他现在在哪儿呢？”我回答说：“我也实在不知道”。一个副官在旁大声叱斥我说：“参谋不知道司令官的下落是胡说”。我回答说：“皇军问我的话我不敢撒谎，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从实说。”

日酋小川认为这样吓唬和这样逼问我们都没有说出于芷山的下落，可能我们真的不知道，面孔语气便稍有缓和，他对赫说：“好吧，你们现在真的不知道于芷山的下落，在天亮7时以前，把他给我找着，让他到我这儿来，就这样回去吧。”我二人赶快回答：“是！是！是！”

我们出了日军大队部大门后才松了一口气，但因不知于的下落，彼此对司令官的安全很担心。

我们回到伪司令部以后，才知道于芷山在另一个买卖家安然无事，我们的心也落底了。

这时于芷山又来电话，指示向伪奉天省警备司令部打长途电话问一问，沈阳市有没有什么事件发生。我依照于芷山上述的指示向沈阳打了长途电话，从曹秉森的回答得知，沈阳市没有任何事件发生。于芷山和随员等共同认为这次事件发生是局部问题。

大家商讨结果，既然是局部问题，不是关东军司令部命令要消灭我们这部分伪军，就当用电报把被夜袭的情况，报告给顾问部，看它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电报到沈阳顾问部以后，很快伪中央顾问部和关东军司令部知道于芷山没有死，为了怀柔他，日伪军最高顾问多田骏、关东军参谋一名，第三天来到山城镇，对于芷山表示“慰问”。以后不久，又把小川大队长转调到别的地方去，以表示关东军司令部对于芷山的“信赖”。

现在回忆起来，日军要人认为于芷山既然没有死，还有可

利用的价值，因为他手里掌握一些伪军，这些伪军中又多是他的旧部下，杀害于芷山一个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这个时期，一定把他铲除掉，万一激起他旧部愤怒，有一个团或者一个旅起义，那将对日军带来很大的不利。在这次暴力的“教育”下，如果他能够得到“教训”，也就行了。同时对其他不忠于日敌的汉奸，也起了一定程度的“教育”作用。

于芷山受到这次惩罚，得到了“教训”，不用说再也不敢对日敌表示不满，说三道四，就是在他的内心连“骑墙”的念头也消除净尽，一心一意地为日敌效劳，作走狗。因此，后来于芷山能够在伪满爬到伪大臣和伪将军那样高的职务。

爱新觉罗·吉兴其人^①

傅大中

吉兴，号培之，辽宁奉天人。姓爱新觉罗，满清皇族出身。吉兴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世纪20年代投奔奉系军阀集团，“九·一八”事变前为东北军中将旅长兼延吉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率东北军一旅投敌，在历史上留下了汉奸的骂名。伪满建立后，他历任延吉警备司令、吉林警备军司令、第二军管区司令、溥仪的侍从武官长、伪满末期任尚书府大臣。吉兴在伪满军中，是十二上将之一，与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于琛瀚齐名为“五将军”。

^① 此为原文的副标题，此文为节录。